



鸦片战争前
传教士眼中的中国

两位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浙江沿海之行

俞强 著

Gutzlaff
Medhurst

山东大学出版社

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眼中的中国

——两位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浙江沿海之行

俞 强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两位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浙江沿海之行/俞强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607-4260-1

I. ①鸦…

II. ①俞…

III. ①传教士—人物研究—西方国家—近代

IV. ①B97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6520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铁路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5.75 印张 139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本书承蒙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特此致谢!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1)
一、概念之界定	(5)
二、研究之现状	(8)
三、关于档案和资料的说明	(22)
第二章 等待中国：新教传教士来华之背景	(25)
一、西方文明的“东扩”	(25)
二、基督教“海外传教”的兴起	(28)
三、中国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和“禁教”政策	(33)
四、英国东印度公司阻挠传教活动	(36)
五、澳门天主教势力的敌视	(38)
六、恒河外方传教会计划	(39)
第三章 两位传教士：郭实腊与麦都思	(48)
一、郭实腊的生平与事迹	(48)
二、麦都思的生平与事迹	(63)
第四章 郭实腊在浙江沿海活动初探	(79)
一、郭实腊三次中国沿海之行	(79)



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眼中的中国

二、郭实腊在浙江沿海的活动情况·····	(84)
第五章 麦都思在浙江沿海活动初探·····	(108)
一、麦都思在中国沿海之行·····	(109)
二、麦都思在浙江沿海的活动情况·····	(111)
第六章 “中国印象”：两位传教士的中国观·····	(122)
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之回顾·····	(123)
二、两位传教士的中国观·····	(133)
第七章 结 论·····	(144)
一·····	(144)
二·····	(147)
附 录·····	(150)
译名对照表·····	(150)
参考文献·····	(157)

第一章 导 言

基督教自公元 635 年(唐太宗贞观九年)由景教教士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基督教在中国如此漫长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兴衰沉浮。唐景教于公元 845 年因武宗灭佛运动而受到株连,消失殆尽,仅存“大秦景教碑”之圣迹;元代,也里可温教和天主教也随着蒙元政治势力的覆灭而远离中原,流传于西北边疆地区;明末清初,耶稣会的在华传教事业盛极一时,影响深远,但也由于康雍乾的禁教政策和耶稣会的解散而陷于停顿。直到 19 世纪初,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的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于 1807 年来华传教,揭开了基督教在华活动的新的一页。等到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被迫割让香港岛,开放上海等五口通商,允许传教士在通商口岸活动,基督教才得以在中国立足,发展壮大。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南北交通汇聚。自唐以来,基督教在浙江就一直十分活跃。元至元十八年(1281),元军南下攻陷临安,客观上促进了基督教在浙江的传播。当时杭州已出现基督教教堂。据张敏杰的研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述及杭州‘有景教礼拜寺一所’。因基督教供奉十字架,故在元朝称基督教为‘十字教’,称教堂为‘十字寺’……杭州的基督教堂又名‘十方寺’即源于此。该教堂的创建者为信奉基督教的



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眼中的中国

镇江府路总管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元至元十六至十九年(1279~1282)间,他先后在镇江和杭州建也里可温寺七处。《梁相记》载马薛里吉思在“杭州蕊桥门建祥宜忽木刺大普兴寺”^①。

明清之际浙江对外贸易繁盛,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早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有限制地开放海禁,就在全国设立了四个海关: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浙海关设在宁波。自从宁波设立海关以来,“外洋红毛诸国番船”来宁波贸易者日渐增多。康熙三十四年(1695)和三十七年(1698),先后在定海设分海关和红毛馆(专门安排西方来浙贸易商人的馆驿)。舟山、定海是中国最早向西方国家开放的港口和窗口之一,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在明末,就有十余位耶稣会士在浙江开展传教活动。由于耶稣会士卫匡国(P. Martini)、殷铎泽(P. Prosper Intorcetta)等人的努力,浙江天主教在明末清初发展得非常迅速。1643年,卫匡国到达澳门,随即来到浙江兰溪传教,建立了一所教堂,后又至杭州、绍兴、金华、宁波等地传教。1650年,由于礼仪之争,卫匡国奉命返回欧洲向教皇汇报在中国的传教情况。1657年,卫匡国又带领南怀仁、殷铎泽等十七位优秀的耶稣会传教士重返中国。1659年,卫匡国回到杭州后,正值原在杭州的传教士阳玛诺逝世,便代理杭州教务。1661年,卫匡国因感染霍乱病死杭州。1674年,另一位传教士殷铎泽奉命来到杭州主理教务。在杭期间,殷铎泽购地兴建了天主教的墓地,重建了教堂,还参见康熙皇帝,平息了一场反教运动,使得天主教在浙江迅速传播开来。除了杭州之外,浙东和浙中南地区的宁波、金华、兰溪、温州等地,传教士也有深入。如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和阳玛诺都多次



到宁波传教。^① 基督教在浙江蓬勃发展之际，一场酝酿已久的反教禁教运动悄然来到。这场运动的起因源于礼仪之争，导致康雍乾的全国禁教政策。在浙江，代表事件就是以当时浙江总督李卫为首制造的杭州教难。李卫抓捕传教士德玛诺，遣送至澳门，并且没收天主教教堂，改为天后宫，亲自撰写《改天主堂为天后宫碑记》，痛斥天主教义和西洋文化有“五大谬”。^②

到了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华。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近代新教传教士在浙江的活动主要是集中在浙江沿海一带，包括宁波、温州、舟山和定海。鸦片战争前，来华传教士在浙江沿海的活动主要包括：(1)对浙江沿海地理的勘探；(2)对浙江沿海人文和社会风貌的考察；(3)与浙江沿海地区的清政府官员的交涉；(4)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散发传教书籍和传单等。与鸦片战争后，宁波作为四大口岸开放以后，传教士们大举进入，开办各种西式的学堂、印刷所、教堂等活动相比，的确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就是这些微弱的活动，反映出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印象。

上文简单回顾了基督教在浙江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本书主要的焦点在19世纪鸦片战争前西方来华新教传教士在浙江沿海的活动情况。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批很奇特的人文群体。他们一方面充当了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驱动力之一，其地位和作用很难定性，而且至今对他们的分析和评价也是众说纷纭，极为复杂。与对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研究相比，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尤其是早期新教传教士的研究要冷淡得多。主要原因正如一些

① 参见[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23页。

② 碑文见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一七《祠祀一》。



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眼中的中国

学者所言：一是年深日久，可以寻觅的数据不多；二是这一时期的西书出版情况记录不多；三是由于历史研究的分期问题，这一段时间恰好处在历史的分界线上，容易被研究者忽略。^① 早期美国教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着力于研究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著名教会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eurette)就预见到：“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发现，在华传教是过去三百年中最重要的运动之一。”^②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则总结说：“在19世纪的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而又最有意义的人物。”^③ “近年来历史学家出版的大量成果已经证明，研究在华传教事业是了解中美关系的关键钥匙”，然而，“这一工作不过刚刚开始”。^④ 以上两位学者所述，不仅揭示了这一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而且表明了其困难程度和艰巨性。

同时，由于资料的缺乏和重视的不够，对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前在华的活动情况，学术界的研究一向薄弱。笔者在先辈前贤不断进取精神的鼓舞下，认真撷取丰富的传教士档案和前人研究成果，希望能够为此事业添砖加瓦，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本书掘取近代两位著名新教来华传教士于鸦片战争前在浙江沿海的活动经历，通过他们的眼睛来描绘当时浙江沿海的社会经济状况，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西方传教士视野下的浙江。

① 参见熊月之《近代西学东渐的序幕——早期传教士在南洋等地活动史料钩沉》，载《史林》1992年第4期。

② Kenneth Scott Late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p. 5.

③ S. W. Barnett & J. K. Fairbank,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

④ J. K. Fairbank. "Introduction", Kathleen L. Lodwick. *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 A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 in Asia, 1867-1941*.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86.



一、概念之界定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把握本书的研究范畴,更好地理解本书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笔者在此先对一些时间、地域和研究对象作一番界定:

首先是时间上的界定。近代新教传教士来华始于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但是由于清政府执行的闭关锁国和禁教政策,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只能在“一口通商”的广州和澳门逗留,更多的是在南洋华人聚居区从事学习中文,翻译《圣经》,撰写、印刷传教手册,创办中文报刊等活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与香港岛的割让,开启了中国的大门,传教士们开始蜂拥而入,掀起一轮新的传教高潮。费正清称之为“19世纪新教在华传播的第二个阶段”^①。本书所选取的时间段,恰好就是1807年至1840年这短短的三十余年。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处在历史分界线上,再加上资料的缺失,还有这段时间很少有新教传教士得以在中国沿海活动,所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几乎成为空白。鸦片战争前,绝不是没有传教士在中国沿海活动,只是受到清政府的干扰,困难重重,很少有传教士愿意以身涉险。但是依然有两位著名的传教士麦都思和郭实腊,为了传播教义,冒险登上商船,前往中国沿海传教和游历。郭实腊就曾经三次游历中国沿海,并撰写游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资料。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笔者觉得有责任去发掘出这段历史,探明他们在中国沿海活动的踪迹,再现他们当时的所见所闻,弥

^① S. W. Barnett & J. K. Fairbank,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0.



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眼中的中国

补历史研究的空白。当然,由于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书中也将对新教传教士在南洋的活动做一番介绍,因为他们在中国沿海的很多活动和南洋时期的工作有密切的联系,或受其影响,理应做必要的说明。而且,尽管鸦片战争前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沿海活动十分微弱,但是他们活动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论述是不能仅仅局限在这短短的三十年内的,所以书中的论述时段有时候会覆盖整个19世纪。

其次是地域上的界定。不可否认鸦片战争前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沿海活动的范围已经相当广阔,南至广州、澳门,北达天津、北京。郭实腊在中国沿海的三次旅行,所到之处就基本上包括了沿海主要的港口城市。1831年,郭实腊扮成中国人,并接受中国的习俗,搭乘中国贸易船只,从曼谷出发,开始了沿中国海岸的第一次航行。此次航行,郭实腊到达了南澳岛、厦门、上海、山东、天津和北京等地。1832年2月,郭实腊随林德赛(Huyh Hamilton Lindsay, 1802~1881,此次旅行中化名为胡夏米)搭乘东印度公司船只“阿美士德号”(Amherst)从澳门出发,开始了他沿中国海岸的第二次旅行,并担任此次旅行的中文翻译和医生。阿美士德号沿途经过了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威海卫等地,复折往朝鲜、琉球。1832年10月,郭实腊乘坐“气精号”(Sylph)从澳门出发,开始了沿中国海岸的第三次旅行,到达浙江和山东等省的沿海港口,详细观察了中国港口的贸易状况。^①但是本书所研究的地域限制在浙江省沿海地区,不是无视新教传教士在其他地区的活动,而是因为其他地区,譬如广东、福建等地区的研究相对比较丰富,浙江地区的研究成果相

^① Gützlaff Charles.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with notices of Siam, C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 Taipei: Cheng-Wen Pub. Co., 1968.



对薄弱。因此笔者决定从这一难点出发,通过梳理传教士手记和教会档案等第一手资料,把新教传教士在浙江沿海活动的情况重新展示出来,恢复其在近代中西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最后在具体研究对象之界定。由于在研究时间和地域上的限定,本书具体的研究对象只有两位新教传教士——郭实腊和麦都思。这与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们纷至沓来、汹涌而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郭实腊是德国人,1826年受荷兰传道会差遣,到亚洲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一带传教。在巴达维亚,他结识了来自伦敦传道会的麦都思,并跟从其学习汉语及马来语,从此开始了其在南洋华人聚居区的传教活动。郭实腊参与《圣经》中译的活动,还创办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宣传基督教义和西方的科学知识。鸦片战争前,他曾三次搭乘商船,以随队医生和翻译的身份,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考察,并把游历的情况撰写成《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这是郭实腊最重要的行动和著作,他因此声名鹊起。这三次航海是西方新教传教士最早做出的打开中国大门的试探,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也是郭实腊身份转变的重要契机。三次航海的活动范围从广东沿海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郭实腊沿路讲道、诊病,分发宗教宣传册、书籍、药物等,直接目的是宣传西方文化和基督教义,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印象。但更进一步的是,他详细记录下了所到之处的海防、军事、军备状况,为他盼望中的枪炮轰开中国大门做积极准备。麦都思是英国人,1816年被伦敦会派往马六甲参与印刷工作。1817年6月12日,他到达马六甲,很快便从米怜手中接管印刷所。1818年,他担任《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编辑,辗转活动于槟榔屿、巴达维亚等地。1819年4月,被封为牧师。1820年,他前往巴达维亚建立传教分站和印刷所,后来成为伦敦会在南洋的主要基地之一。1823年7月,在巴达维亚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中文月刊。他在东南亚一带传教近二十年,其间曾于



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眼中的中国

1835年从广州北上,游历上海、山东、浙江、福建沿海等地。^①他在著作《中国:现状与未来》中记录了这次游历的经过。这两位传教士的浙江沿海之行,是传教士们进入中国的早期尝试,反映了传教士们对进入中国的乐观态度,以及所遇到的困难和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对策。这些活动,给后来的传教士提供了不少的情报和重要的参考。他们在浙江沿海的活动,一方面为了传播基督教义,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西交往和文化的交流。他们把自己在浙江沿海游历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介绍给西方世界,成为近代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开放的窗口。这在近代中西交往和文化交流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二、研究之现状

新教早期入华传教士是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主要群体,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他们的活动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一百多年来,中外宗教界和学术界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著。笔者在此考察这些前辈先贤们的学术成果,一方面希望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汲取他们的研究方法,取得些许新的发现;另一方面也提出以往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希望能够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加以解决。由于这方面的论著实在是汗牛充栋,再加上笔者才疏学浅和研究过程中的缺陷,仅能就所接触到的有关论著来做一个力求详尽的评论,大致理清其中的学术脉络。

^①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Taipei: Cheng-Wen Pub. Co., 1967. pp. 25-27.



(一) 中国内地的研究状况

中国的教会史研究首先是由教内人士发起的。民国初年，东吴大学谢洪资教授的《中国耶稣教布道小史》、陈金鏞的《中国布道史》和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①相继问世。1927年，陈垣先生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②，开中国教外人士研究教会史之先河。这些著作主要记录了基督教在华活动的历史，但相对忽视了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宗教界和学术界对教会史的研究非常薄弱，甚至陷于停顿。1979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历史研究也逐渐走出冷宫，教会史的研究也得以开展。

反观1979年以来大陆学术界对教会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研究的重心是教案，特别重视教会与西方列强侵华势力的关系、教会与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和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首先是教会史料，主要是教案史料的整理工作成绩斐然。1979年到1993年共整理出版了四种教案资料，依次是廉立之等编的《山东教案史料》^③、王明伦选编的《反洋教书文揭帖选》^④、四川省档案馆编的《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⑤和庾裕良等编的《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历

①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版。

② 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③ 廉立之等编：《山东教案史料》，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④ 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版。

⑤ 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⑥ 庾裕良等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眼中的中国

史系合编的《清末教案》^①，在规模和数据齐备上更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其次是相关的学术讨论会陆续举行，推动了教会史研究的发展。主要的会议有1982年6月在四川大竹举行的反洋教运动与余栋臣起义学术讨论会，1985年4月在四川成都举行的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1987年9月在安徽绩溪举行的19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1989年11月在贵州贵阳举行的第三届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1992年11月在湖南怀化举行的第四次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这些研究成果对近代中国教案发生的原因、性质、地位、作用以及与义和团的关系都做了深入的研究。李时岳的《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②和张力、刘鉴唐合著的《中国教案史》^③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个阶段，还值得一提的就是顾长声先生的代表作《传教士与近代中国》^④。此书1981年出版，可谓国内研究来华传教士的开山之作。1986年，顾长声先生又出版了他的另一部研究新教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⑤。这部书是一个新教来华传教士的合传，共记录了二十九位传教士的生平和活动，提供了他们在华活动的基本资料。此两书体系之全、内容之广、史料之博，多年来大陆同类学术著作尚无出其右者。

第二个阶段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重心从教案、教会与中国社会的矛盾转到探讨教会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会与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关系。首先是教会大学研究热的兴起。1989年，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② 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④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行的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中国教会大学研究的开端。此后,一批学者致力于此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史静寰所著《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①、高时良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②、顾学稼主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③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值得一表的还有两件教会大学研究的盛事:其一是1994年,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中国首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并且陆续出版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其二是由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教授吴梓明教授主编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自1996年起由福建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其次是关于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讨论。大批学者着力于探讨教会与中国近代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其中有影响的论著有:杨天宏著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④、熊月之著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⑤、顾卫民著的《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⑥、何晓夏与史静寰合著的《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⑦,还有王立新1997年出版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⑧,以及与史静寰合著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⑨,注重从现代化的角度来探讨传教士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近代化道路

① 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③ 顾学稼主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④ 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⑥ 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⑦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⑧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⑨ 王立新、史静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